

荔园文创译丛 | 李凤亮 主编

BE CREATIVE

创意生活

新文化产业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W CULTURE INDUSTRIES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 (Angela McRobbie) 著

何道宽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荔园文创译丛 | 李凤亮 主编

BE
CREATIVE

创意生活

新文化产业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W CULTURE INDUSTRIES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 (Angela McRobbie) 著

何道宽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 / (英) 安吉拉·默克罗比
著；何道宽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5354-6

I. ①创… II. ①安… ②何… III. ①文化产业—产
业发展—研究 IV. ①G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088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 (Angela McRobbie) 著
何道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5354-6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 Ⅹ

定价：35.00 元

译自 *Be Creative: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w Culture Industries*,
First Edition, by Angela McRobbie

Copyright © Angela McRobbie 2016

The right of Angela McRobbie to be identified as Author of this
Work has been asser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K Copyright, De-
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td.,
Cambridge.

“荔园文创译丛”（第一辑）总序

“荔园文创译丛”是由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发起并组织，编译国外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前沿论著并在全中国发行的系列译著。本译丛旨在嘉惠学林，连接文化创意产业政、产、学、研诸界，为我国高校师生、研究机构学者、政府文化部门管理者及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提供了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新趋势、新理论、新动向、新热点的窗口。译事不易，原作的选择我们尤其慎重。“荔园文创译丛”编译计划自2014年发起以来，我们遍访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国家权威出版社出版的该领域学术著作，从中外学者和商务印书馆编辑推荐的数十本外文著作中精选出本套丛书。我们选取了美、英、法、澳四国文化研究及文化创意产业领域具有前沿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新书四本，经审稿委员会专家审阅，同意将其作为“荔园文创译丛”第一辑书目翻译出版。寒暑易节，经过编译团队3年多的昼夜奋战，本译丛即将付梓。通读这四本论著清样，我惊喜地发现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前沿性

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教授在中国具有广泛的知名度，他的《创意产业读本》（中文版）曾被作为文化创意产业专业的教材。哈特利教授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产出量，而且不断挑战学科边界，探索学术前沿。是次推出的《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便是这样一次学术突围的前沿性成果。在这本新著中，媒介理论家、文

化理论家约翰·哈特利和演化经济学家、制度经济学家贾森·波茨（Jason Potts）向我们展示了行为科学和文化研究统一的愿景，突破了传统学科疆界的疆界。两位作者综合了跨度可观的文化研究、语义学、符号学、复杂理论和进化论、社会学、人类学、认识论哲学等学科，推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法，将知识进化论、文化进化论和语言意义进化论融为一炉，借以研究文化如何通过意义演化，形塑群体，增进知识。《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意在推出源自文化动力学而不是经济环境的研究路径，还重点探讨了创意城市和复杂的文化系统，对当下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创意城市建设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具有较强的参照意义。哈特利教授团队于2012年发布了“创意城市指数”，这项成果以新方式回答了文化在形塑城市中的作用：为何一些城市是创意性全球都会，而另一些城市则不是？《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知识与革新的自然历史》始终在思考：什么因素构成创意城市的潜在优势？作者认为，文化不是城市吸引人的要素，而是符号生产资源；在应对复杂问题时，资源使城市成为演化的、自组织的、极富生产力的机制。我相信，如果这些真知灼见能被运用，中国的文化建设理念和面貌必将发生变化，我们将不再生硬地隔离和复制濒危的文化形式，而应该发挥文化的成长性和弹性，将它们带上进化和变革之路。

二、经典性

当前，我国已跨入名副其实的出版大国。书籍易得，但精品难寻，学术译著尤甚。但我们编译团队却在书海中幸运地找到了这批具有经典性的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力作。以《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一书为例，这是北美杰出的公共文化政策学者凯文·马尔卡希（Kevin V. Mulcahy）教授的扛鼎之作。他躬耕公共文化政策领域40余载，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学院公共政策与行政专业创建文化政策专业方向。他的《文化政策：概念界定与理论路径》一文是《艺术管理、法律与社会》（*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 Law, and Society*）杂志迄今为止引用率最高的优秀论文，其他系列论文也在艺术管理和文

化政策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早年在美国布朗大学和宾州大学接受了严格的政治科学训练，又对文化艺术问题情有独钟，是研究文化政策的最佳人选。相对而言，他的学术产出不大，但凡推出的却都称得上佳构。他学术视野开阔，善于深入浅出地阐述自己敏锐的学术见解。这些特征都鲜明地体现在《公共文化、文化认同与文化政策：比较的视角》这一最新力作中。比如他论述“公共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差异时，认为“公共文化”提供的是我们之“需要”，而“娱乐文化”提供的则是我们之“想要”。“娱乐文化”提供我们“想要”的东西，多半是由于它们是熟悉的、有保障的；相反，“公共文化”领域提供的机会是考虑我们可能“需要”什么，那样的需要可能是困难的、有争议的 and 陌生的。一语中的，让人不得不佩服。

三、跨界性

跨界合作、融合发展是当前全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科技特别是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努力融合科技与人文艺术，但现实情形是科技界不懂创意，也不欣赏依赖直觉的思维方式，而文化艺术界又不懂技术。既懂技术又懂艺术的复合型跨界人才成为稀缺资源，在学界也少有技术专家愿意跨界投身研究文化创意产业的。而本译丛的《符号性商品的产业化——基于文化产业的创意产业》一书作者们便是这少有的技术专家团队。他们是信息和通信科学领域教授飞利浦·布吉庸（Philippe Bouquillion）、贝尔纳·米埃及（Bernard Miège）和皮埃尔·莫格林（Pierre Mœglin）。这是一本技术专家研究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专著，该研究继承了前人对媒体的社会经济、文化产业理论和通讯政策经济的研究成果。在文化产业领域，该书研究了图书出版、录制音乐、新闻、视听相关的电影业等传统行业以及电子游戏、信息媒体等新行业；而关于创意产业，该书研究了时尚、奢侈品和艺术手工业。作者站在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技术前沿，阐述了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它对创新的需求和对复制性的限制的持续共存。作者致力于解决技术发展对文化产业造成的冲击从而形成的新问题，比如：

服务于创意经济的信息经纪、政府对符号性商品的监管政策、数字创意产业的公共政策等前沿问题，作者还表达了对“文化例外”和以“文化多样性”名义出台的支持政策的质疑。这也充分印证了我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的内在机理与战略路径研究》时的一个结论：相比之下，科技界的文化自觉似乎整体上高于文化界的科技自觉。值得一提的是：飞利浦·布吉庸教授团队在探讨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区别时引用了本丛书作者之一约翰·哈特利教授2009年发表的学术观点：“创意”艺术属于一个方面；“文化产业”如媒体和电影则属于另一方面。跨界、跨地域学界精英在这套译丛中自然神会。相信这样的跨界探索能够给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政、产、学、研界提供诸多启迪。

四、在地性

我们深知，引进译著，目的在于为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提供参照和借鉴。《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一书便是这样的一本具有较强在地性和参照价值的新著。这是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教授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最新力作。金匠学院于1891年以工艺和娱乐学院（Goldsmiths' Technical and Recreative Institute）之名成立，后于1904年并入伦敦大学，更为现名，专攻传播媒体与文化创意、艺术课程。安吉拉·默克罗比是英国媒介与传播学家，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传人。她受业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本书书名里的“文化产业”（Culture Industries）一词，就意在彰显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阿多诺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术渊源。与本译丛其他几本论著相比，本书充满强烈的女性主义气息、后福特主义气息和创意现场气息。很多章节内容就来自于她在金匠学院课堂教学中与学生的讨论和她对伦敦和欧洲其他创意城市的产业观察。她介绍自己的访谈经历、学生的创新创业成就，通过众多社会项目和社会企业的案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后创意产业发展的新阶段。围绕欧洲社会对文化经济和创意经济的论辩，她研究创意就业机会问题、新形式的社区建设问题、新形式的文化经济开

发问题、潮人经济问题。这些研究饱含时代气息，相当接地气，“企业式大学”“教学机器”“数字工匠”“新手工艺人”等概念的提出和探讨何尝不是对中国问题的预研究？

译事艰辛，译丛组织同样不易。在此套译丛即将发行之际，回首这三年来围绕译丛所作的工作，我首先要向主译何道宽教授致以衷心的感谢！他译著等身依然勤奋笔耕，夙兴夜寐，为中国传播学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学科建设倾情贡献才华和力量。作为资深翻译家，他不仅满腔热忱，而且虚怀若谷，对于后学指出的错讹或笔误能虚心接受，并迅速完善。衷心感谢法语翻译石冰怡老师！她是毕业于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高材生，顶着身体不适和赴法公干的压力高质量地完成了本套译丛的法语翻译重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译者编者多方互动的经历，我们深知，尽管我们已经如履薄冰地尽力减少翻译的错讹和失误，但“文化折扣”依然存在，错讹误读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感谢周建新、张晓红、黄玉蓉、温雯、邓文君、张晗、乔纳森·帕奎特（Jonathan Paquette）、哈桑·巴克什（Hasan Bakhshi）等老师为本套译丛的遴选、审定、组织、编校费心费力。相信读者朋友的认可是对他们辛勤劳动的最佳犒劳！

李凤亮

2017年金秋于深圳

译者前言

一、《创意生活》，其书其人

《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Be Creative: Making a Living in the New Culture Industries*）的书名取自作者与柏林学者玛丽龙·冯·奥斯滕（Marion von Osten）合作工作室的名字。

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1951—）执教于伦敦大学金匠学院，是英国媒介与传播学家、文化理论家、女性主义者、批评家、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传人，著有《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女性主义与青年文化》《文化社会：艺术、时尚和流行音乐》《文化研究的用途》《女性主义余波：性别、文化和社会变革》《女性主义、女性气质和人的完美》《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和英国黑人和亚裔艺术的崛起》《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等。

她受业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该学派创建人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图尔特·霍尔和爱德华·汤普森等的嫡传弟子，深得阶级分析、文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真传。

她说：“我在书名里保留了‘文化产业’一语，意在显示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血脉。我的学术生涯就是在伯明翰起步的。”

她又说：“我在这里所做的研究是延伸和更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模式，将其带出休闲的领域，并放进工作的领域。”

二、文化研究学派的离散与传承

“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1964年伯明翰大学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

中心是其核心。“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主张阶级分析，试图用文化研究方法和人类学方法打破英国的“贵族”精英传统，对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抱肯定的态度，这是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歧之一。领军人物有霍加特、威廉斯、霍尔和汤普森等。

遗憾的是，名重半个世纪之久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2002年6月被迫关闭了。原因是：办学效益不彰。“中心”消亡了，但一拨接一拨的传承人继续其未竟的事业。

仅就我学术翻译所涉，该学派的继承人散布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英国开放大学等机构。

《创意生活》是我翻译的英国学者的第五部著作，其余四本是：《重新思考文化政策》（*Rethinking Cultural Policy*），吉姆·麦圭根（Jim McGuigan）著；《媒介、社会与世界》（*Media, Society, World*），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著；《互联网的误读》（*Misunderstanding the Internet*），詹姆斯·柯兰（James Curran）等著。这五本书的作者都继承了“文化研究学派”的传统和思想。

金匠学院集中的名家有：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迈克尔·克雷格-马丁（Michael Craig-Martin）、尼克·库尔德利、安吉拉·默克罗比等。

三、各章提要

绪论“教育学问题与创意经济”和结语“欧洲的视角”是全书的总纲和结论。纲举目张，“绪论”和“结语”读者可首先着力，以求速达该书的核心主题。

第一章“从俱乐部到公司：创意世界加速，政治文化衰减”绘制了伦敦和柏林一系列交流与合作的路线图。

作者说：“第一章描绘英国经济新文化产业里工作和就业的界定性特征，以伦敦为重点，这是初步和临时的尝试。它还描绘文化产业从‘第一波’到‘第二波’过渡的情况。所谓‘第一波’文化产业就是上述《路线图》（1998）‘文化、媒体和运动产业’里描绘的文化，文化产业

‘第二波’经济上更亢奋，迅速裂变，在过去三年中兴起。‘第二波’的特点是去专门化，促成去专门化的因素是与互联网的交叉、新媒体创意能力的利用、艺术界多媒体能力的迅速增长，以及我所谓的‘独立艺术家’角色的缩小。”（第18-19页）

第二章“解析创意劳动的政治”批评理查德·佛罗里达过分乐观和浪漫主义的文化产业主张。作者断言，在佛罗里达眼里，“一切都是玫瑰色的”。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1957—）是美国城市研究理论家，著有《创意阶层的崛起》《创意新贵》《城市与创意阶层》《创意阶层的逃亡》等。

默克罗比的批评思想丰富。限于篇幅，仅摘几段话予以说明。

佛罗里达“通过‘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实现都市更新的一整套新的语言……他强调，人们如今能逃避千篇一律、没有满足感的枯燥工作”。（第46-47页）

“佛罗里达这些理念瞄准的对象是城市领导人和决策者。由此产生的城市政策旨在宠爱和保护享受特殊待遇的创意工作者，其希望是，他们为弱势阶层树立榜样、努力工作、纳税、为城市福利贡献力量。这是佛罗里达强调人力资本的模式。”（第48页）

“佛罗里达倡导的商学院模式取代了悠久的社会科学传统，包括都市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第50页）

“佛罗里达反传统而行之，他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创新者勾勒出一幅飘飘然的激动人心的自我形象，和任何创新者的广告造势形象相比，这个自我形象都极为相似，难以区分。表面上，这个形象拥抱整个创意阶层，实际上，它只留给心比天高的人，只留给效仿佛罗里达路子的人。”（第50页）

第三章“作为人力资本的艺术家的”论英国的创意产业和劳动改革。

作者认为，“新工党执政时，尤其1977年以后的几年里，创意经济的造势完成了‘劳动改革’”。（第61页）

“在这里，创意被用作劳动改革的载体，改革的旗帜是‘人才经

济’。”（第63页）

这一章检视和批评了诸多大家的相关思想，包括法国的米歇尔·福柯、米歇尔·菲尔（Michel Feher）和美国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论述。

第四章“后福特主义的性别”考察女性在创意产业里的作用，比较伯明翰和博洛尼亚工人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特色，批判所谓“情感性劳动”。

作者说：“本章考虑女性作为英国工作社会的驱动力，同时对性别、阶级、工作和社会流动性等问题上的许多社会学思想的理路持反对的态度。”（第89页）

“这一章的目标是，批评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借以为性别和创意政治提供一些新的理论见解。”（第92-93页）

“我将把重点放在女性情感的管理上，将其作为‘工作愉快’的必要条件。不能找到或表达这样的愉悦就是个人失败或工作不适合的标志。达成这种当代情感的工具是‘激情工作’。”（第102页）

本章论及和批评的学者有：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ls）、伊莎贝尔·洛雷（Isabell Lorey）、艾玛·道林（Emma Dowling）、迈克尔·哈特（Hardt Michael）和安东尼·奈格里（Negri Antonio）。

作者当之无愧地肯定自己在女性研究上的成就：“我的著作对伯明翰学派做出贡献，我主张，年轻的工人阶级女性能利用女性通俗文化，去表达对高雅年轻女性规范的幻灭，去表达她们对自己相对有限选择的失望。”（第97页）

第五章“柏林时尚”用案例研究柏林时装设计的微小企业，描绘一个不同于英国流行模式的创意经济范式，突显柏林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

作者在“本章小结”里说，“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效应，由于柏林没有像英国和美国那样反复把福利妖魔化，‘创意生活’的呼唤更有吸引力”。（第141页）

第六章“干得好的工作？”

在此，默克罗比礼赞平凡工作，批评理查德·桑内特，研究“干得

好的工作”。

“绪论”开篇她就说，“我将在第六章里思考桑内特的三部曲，对他论‘匠艺’的一些思想却不敢苟同”。（第14页）

第六章一开篇，她就提炼桑内特三部曲（《眼睛的良心》《工匠》《尊敬：不平等世界的人格养成》）的四个主题：（1）新工作体制里主体的人格侵蚀；（2）工作生活里的时间、记忆和叙事；（3）手工技艺的价值；（4）城市环境里的“尊敬”。（第142页）

她接着亮明本章的宗旨：“本章的目的是研究新创意工作，不是分离它、拔高它，使之脱离日常的工作生活，从而使之显得例外，我的目的刚好相反。我想重新嵌入创意工作，使之与其他不带灵感光环的工作并列，供人检视，使之不带上创造性的神奇因素。我还想它重新嵌入生活空间，使我们能在城市日常生活的语境下思考这种工作生活。我想找到一个办法，去抗衡浪漫遐想，并强调‘干得好的工作’的普通报偿。理查德·桑内特帮助我走这个方向。”（第145-146页）

她认为，桑内特和佛罗里达构成对立而互补的两极：“理查德·桑内特的论著宛若与理查德·佛罗里达的论著抗衡的强健的逆流，他和许多各行各业里年迈、幻灭的工人交谈。数十年间，他研究许多城市的日常生活，把注意力投向平凡的人。”（第143页）

她坦承，“桑内特的《眼睛的良心》（*Conscience of the Eye*）使我获益良多。他使我尝试把创意劳动拉到接地气的层次，将其放进日常的语境，使之能与平凡的活动一道分析”。（第149页）

她断言，“桑内特提倡复兴精湛工艺（craftsmanship）的理念，借以抗衡创意工作流行的氛围”。（第154页）

第七章“结语：欧洲的视角”

在这出压轴戏里，默克罗比扫描和比较了英国和欧陆的创意产业。

她说：“就两个相互联系的课题提出一系列的反思。第一个课题就欧洲委员会资助的两个项目提出一些观察和洞见。第二个课题更简明，是终场曲，通过审视在英国地位凸显的‘社会企业’来完成；英国‘社会企业’的许多理念是从美国商学院进口的。我要问：在文化产业框架里，

还可以设想其他形式的社会企业吗？”（第 166 页）

她指出英国培训项目和这些欧洲培训项目的最大差异：“在英国，为失业成人和年轻人提供培训的机构迅速私有化”，是惩罚性的。相反，“意大利巴勒莫和斯波莱托的培训项目显然是非惩罚性的”。（第 171 页）

她又说：“就英国而言，解决社会问题越来越靠创新性的、不言自明的新自由主义方式，越来越靠文化的手段。相反，欧共体的基层一级却不太情愿地跟随这一趋势。换言之，我们可以说，在欧盟社会基金项目里，力量的平衡维持了社会民主主义原理，社会民主主义的存在比英国同类的政治话语更强有力。”（第 183 页）

四、遗憾与补救

《创意生活》的文风令人却步，令人遗憾。在我近四十年 70 余部的学术译作中，这本书的文风极其特殊，极其难解。该书英文本仿佛是中国古代的雕版印刷品，不分段落，不讲句读。段落长达一两页者，不在少数。句子叠床架屋，长达半页者，亦不在少数。其负面效应一目了然：吓坏读者，还可能使人厌恶而弃之不顾。

为了更好地传达作者原意，为了使读者不至于被吓跑，译者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1）过长的段落一分为二三，甚至一分为五六；

（2）叠床架屋的长句尽可能切短；

（3）以上补救措施遵从的原则是：a. 既尊重作者，又尊重读者；b. 忠实于原文，真实传达原意，又增益文风。

何道宽

于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6 年 12 月 26 日

谢 辞

首先感谢柏林的艺术家和教授玛丽龙·冯·奥斯滕 (Marion von Osten)。新千年初,在她的张罗下,我早期有关英国时装设计师的著作被译成德文出版。同时,她在苏黎世举办展览,取名为“创意生活”(Be Creative)。我借用她的展名作为我的书名。2002年,玛丽龙邀请我加盟德国文化部资助的“欧罗巴工作室”(Atelier Europa)。这一次合作的结晶产生了许多想法,我在这本书里继续谈这些想法。

第一章的内容首次在德绍的包豪斯学校宣讲,接着在慕尼黑艺术协会宣讲。实际上,这本书绘制了伦敦和柏林一系列交流与合作的路线图。因此,我要感谢以下的柏林朋友: Kerstin Drechsel, Rita Eichelkraut, Maria Exner, Marte Henschel, Ares Kalandides, Bastian Lange, Oliver MacConnell, Bettina Springer, Tatjana Turanskyj, Agnes Zelei。我要感谢在柏林和斯波莱托两地工作的 Monika Savier。我还要感谢 Nana Adusei-Poku, Sabine Hark and Ulrike Ottinger 等柏林朋友的支持。

本书撰写的很多内容都是我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任教的内容,是在经年累月、每周每天教学的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的经费始终很紧,但我们还是想办法举办了许多活动、研讨会和讲演,邀请世界各地的学者。反过来,这些活动推进了我们的研究计划。应邀来访的学者包括已故的乌尔里希·贝克 (Ulrich Beck)、温迪·布朗 (Wendy Brown)、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 Butler)、安吉拉·戴维斯 (Angela Davis)、米歇尔·菲尔 (Michele Feher)、毛里齐奥·拉扎拉托 (Maurizio Lazzarato) 和伯尔纳·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许多学生给我激励,我热忱地表示谢意, Sara Ahmed, Lisa Blackman, Matt Fuller, Sarah Kember, Scott Lash,

Gerald Lidstone, Carrie Paechter, Sian Prime and Joanna Zylinska 尤其给我助力。感谢金匠学院提供经费，使我撰写本书的许多研究工作得以在伦敦、柏林和意大利（含翁布里亚和西西里）进行。近年，我又得到艺术与人文研究会的 CREATE 赞助，该研究会设在格拉斯哥法学院。借此机会，我要感谢该会的支持，感谢我那些研讨会上分享到的研究心得。

这本书的写作比预计时间长。我要感谢几家出版社和杂志社，它们允许我使用以下章节。第一章原载《文化研究》（vol. 16, no 4, 2002），感谢 Taylor and Francis 允许我将其纳入本书。第四章的部分段落原载《新构成》（*New Formations*）2011 年第 70 期，感谢 Lawrence and Wishart 允许我将其纳入本书。第五章的简明版原载《文化研究》（2013），再次感谢 Taylor and Francis。第六章的几个片段原载《乌尔里希·贝克纪念文集》，感谢汉堡的 Transcript Verlag 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些片段。

国外同仁邀请我宣讲本书的一些章节。我尤其要感谢蒙特利尔协和大学的诺玛·兰提西（Norma Rantisi）和 Matt Soar。我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同样，我要感谢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性别、种族、性行为和社会公义研究所的 Mary K. Bryson and Janice Stewart。2012 年，我在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造访一个星期，任胡克访问教授。2011 年和 2013 年，我应邀短期造访波特兰州立大学，容我感谢 Priya Kapoor 教授。2011 年，我应邀出席慕尼黑的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举办的乌尔里希·贝克纪念会，不胜荣幸，第五章的初稿就是在那里宣讲的。和许多人一样，我深感痛失乌尔里希·贝克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这两位思想家。他们的影响在本书的书页里流淌。

最后要感谢朋友和家人。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和弗龙·韦尔（Vron Ware）长期与我为邻，住伦敦北；谢莉·查尔斯沃思（Charlesworth）、丹尼斯·赖利（Denise Riley）和伊莉特·罗戈夫（Irit Rogoff）也是老邻居。我要感谢旧金山的莎拉·索恩顿（Sarah Thornton）及其家人，感谢我爱丁堡的妹妹罗斯·兰伯特（Ros Lambert）。一如既往，我感谢女儿汉娜（Hanna）。我把这本书献给两个小男孩 Joseph McGhee 和 Gabriel McGhee。